



1935年,李惠堂在上海参加全运会。

昔日“亚洲球王”李惠堂

“攀登巴黎塔,纵目倚栏杆。万里思乡国,茫茫天地宽。”这首“感慨甚深”的诗,竟出自“亚洲球王”李惠堂之手。

世界杯战幕开揭,或因国足再度无缘,老球迷们格外怀念李惠堂,“世界五大球王”“一生进1860个球”“射门闷死守门员”等说法再度风行。这些说法夸大了李惠堂的运动能力,却掩盖了他的另一面——爱国者、诗人和思想者。

李惠堂受尊重,不只因踢球好,更因他的情怀、胸襟与气度。《李惠堂评传》说:“凡是一个完美运动员所应有的精神他都有。以他的技术言,可以称‘足球之王’,以他的精神言,可以称‘足球之圣’。”(胡帝,《足球世界(上海)》1935年第1期)

谈论李惠堂,不应只追慕李惠堂的球技,而忽略他的精神境界。本文主要依据香港足球史学会欧阳逢康(笔名十一划生)的网文和《五华文史(第九辑):球王李惠堂专辑》写成。

五华,一度任粮仓主任,因叔父李大超正任广东省粮食评议会主席。李大超是国民党要员吴铁成的亲信,李惠堂一生受其影响。

据欧阳逢康钩沉,李惠堂在五华组织了“老柴”(指老人)足球队,“推动当地体育运动的发展,亦为抗战募捐”。1943年,李惠堂独自去重庆,响应宋庆龄号召,和叶北华等加入“航建”足球队(班主即李大超),义赛138场,收入全部支援抗战,被授“少将参议”衔。

在抗战中,李惠堂坚持“足球救国”的理想,在家乡学校进行的演讲中表示:“我深信中国不会灭亡的……将来无论抗战或抗战完成后,要建设新中国,都要有高明的智慧学识,和伟大的体格精神,才能创立伟大的功业。”

抗战胜利后,40岁的李惠堂回香港继续踢球,1945—1946年赛季仅上场5次,进5球;1946—1947年赛季只上场1次。

李惠堂身高1.82米,却自称不擅头球,因初入南华队时多次与中锋黄柏松争顶,黄的脑袋硬,李痛得受不了,致“每有高球,他都退后十码八码”。到上海后,队友戴麟经头球厉害,回香港后,又有冯景祥替他顶球,李惠堂“逐渐养成不跳高不顶球的习惯”。

退役后李惠堂当过教练、足球官员、足球解说员。

作为香港广播史上首位现场解说员,曾被报纸批评为“东西并用,拖泥带水,有时自己看至入神,几不知所语云何”,但也有老球迷称他是“优秀球评家”。作为教练员,李惠堂率队成绩辉煌,当时韩国队教练金智星称他是“亚洲不可多得的教练人才”。

李惠堂曾被对手恶意踢断过腿骨,也曾因比赛失利,被球迷追至家门口,一路谩骂,但在《球圃菜根集》中,李惠堂表示:“体育真谛,道德为本,技术为末。”他常告诫球员“不义之行,纵逃过他人眼帘,也逃不过昭昭天理,逃不过自己良心”。

60岁时,李惠堂以诗回望平生:“忧乐常关天下情,愧无建树以球鸣。一腔肝胆存人热,半世风尘为国争。拔帜岂曾功在汉,洁身遑计利和名。逢辰笑酌延龄酒,许共贤流致太平。”

李惠堂晚年患糖尿病(或与嗜可乐有关)、肾病、癌症等,1979年逝于香港,终年74岁。

李惠堂认为踢足球“有三个大目标:第一是求人格的修养;第二是求高尚的娱乐;第三是求身心的锻炼”。把足球看成提高个人素质、报效国家的方法。当现代足球越来越强调专业性、渐成一种谋生手段时,许多高素质人才基于风险评估,不愿进入,反而约束了足球发展,则李惠堂以足球育人、而非靠足球吃饭的想法,值得深思。蔡辉 来源:北京晚报

“球王”成功 不靠绝技

1905年夏,李惠堂生于香港大坑村。父李浩如是广东五华人,出身贫寒,从小采石,后至香港从事建筑业,成巨商,因参与粤汉铁路工程建设,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保举,获蓝翎顶戴,时人称“石行伟人”。李浩如有24房妻妾,32个子女,李惠堂是长子,行三。

李浩如性严,“一触其怒,鞭挞至极”,李惠堂回忆,家中“差不多有十六世纪的风气”。

李惠堂的母亲性宽厚,李惠堂称:“她的生平,最伟大的便是‘与人无忤’……数十年来我未尝有一次身闻或目见她会和人家生气,和人家口角争长论短,她逢着不如意事时,最多是背人饮泣暗自郁抑。”

一次李惠堂为看球而逃学,被母亲鞭答,事后她流泪不已,表示:非怜惜儿子,而是自惭,为什么用十二分精诚来教导子女,而子女仍不受教。

这番话让李惠堂“哭了一回又一回”,一生坚守“读书不忘体育,体育不忘读书”。李惠堂刚参加成年赛时“总有点懦惧,瑟缩不敢和对方争夺”,父亲骂他“没有勇气没中用”,母亲却鼓励:“到了场中,便要奋斗。”

足球生涯中,李惠堂从未被裁判警告过。

坊间传说李惠堂6岁时被送回老家,以青柚为球,以门旁狗洞练射门,10岁才回香港。李惠堂自己从没这么说过,他的幼子李炳德(也曾是职业球员,踢过亚洲杯外围赛等)认为:当时香港足球的普及度和水平更高,李惠堂培训球技必然是在香港,不会是由五华孕育出来。

李炳德同时认为,《踢球者》杂志选李惠堂入“世界五大球王”,亦不可能,当时信息欠发达,李惠堂1947年退役,岂能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许多外国人投他的票。

最早报道“世界五大球王”的卢振喧称,是李惠堂亲口告诉他的,李炳德从未听父亲说过,但表示:父亲重声誉,对表扬会欣然受

落,不会刻意查证,是否误传,可能李惠堂也不清楚。

欧阳逢康查到了当期杂志,确有一篇专访李惠堂的文章,但未提“世界五大球王”,而此前欧洲人看到的,只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队0:2输给英国队的比赛,“而那次李惠堂全场被盯死,无甚表现”。

据欧阳逢康统计,李惠堂在香港,联赛、杯赛、友谊赛、义赛、表演赛等加起来只有198个进球,在上海与印尼约150个,代表国家队出访赛共213个,与传说中的1860个相差甚远,不足与贝利等比肩。

传说李惠堂射门力大,曾闷死守门员、射穿球网。前者李惠堂亲口否认过,后者因当时无尼龙网,绳网经风吹日晒,易弊坏,罗斗文、孙锦顺都曾射穿球网。至于李惠堂的卧地射门,被媒体吹嘘为领先全球的“绝技”,但李惠堂在自著的《足球基本技巧》一书中,曾批评非上策,因准度很低,且门前人多,易被踩伤。

有精神追求 一生在学习

不靠绝技,成绩何来?李惠堂的答案是:“世间凡百事业,断无不学而成,即以余今日所得之微绩而言,亦皆幼年以达今日连绵不绝之艰苦奋斗,勤学不辍,潜心研究之佳果,全非天上赐予或侥幸所致者。”“时至今日,余尚孜孜不倦,常在学习中也。”

在《李惠堂评传》中,作者胡帝注意到李惠堂的精神品质——大度、有恒、公正、殷勤、纯洁。特别是“有恒”,“现在东华诸将最缺少这种精神”。

有天分者多,有精神高度者少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李惠堂便称足球为“国技”,立志:“为球界谋再接再厉之举,为艺术作登峰造极之图,务使绵历五千年、纵横九万里之古国人士,声威播于遐迩,勇毅振乎殊俗,藉挽狂澜于既倒,而系国脉于垂危。”这份雪国耻、扬国威的“足球救国”理想,让李惠堂能承受更艰苦的训练,能力持续提高。

当时香港足球领先全国,1925年,李惠堂突然去了上海。因李浩

如在五华乡下为李惠堂定了亲,逼其完婚。19岁的李惠堂遂与18岁的廖月英“私奔”。传说李家骑虎难下,竟让李惠堂的妹妹代为拜堂,新娘空守2年后回了娘家。

李惠堂将香港足球的先进理念带到上海,改变了当地华人球队“爱踢高球、简单粗陋的踢法”。正逢“五卅运动”,李惠堂率队战胜洋人球队,让国人扬眉吐气。上海球迷称李惠堂“球怪”“怪脚”“一阵烟”(因他在10秒内跑完百码,即91.4米)等,1929年起,称他为“球王”。《上海足球》赞李惠堂“是上海,甚至是中国足球史上的唯一伟人”。

李惠堂写道:“我最近的希望是能率队周游各国,表现我国青年的精神;远一步的志愿,是能在世界足球场内夺归鳌头,使他人不敢轻视我国。”

当时中国足球队是亚洲足坛霸主,除首届远东运动会(亚运会前身)外,连取9次冠军(其中一次与日本队并列冠军,李惠堂参加了3届),中国被称为“亚洲足球王国”。

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,中国队首轮即败,坊间多强调中国队为筹资,沿途比赛致体力下降,李惠堂却看到了差距:“他们(指西方球队)的练习是持之以恒,不似东方的队伍多是恶劳好逸、十寒一曝的。”

1948年9月,李惠堂趁伦敦奥运会之机,去英国罗布雷城参加了足球教练训练课,他是该班唯一外国学生,亦是该校首位中国学生。

道德为本 技术为末

1941年12月,香港陷落,日寇让李惠堂组织球队到长春,参加伪满洲国所谓“十周年庆”,汪伪“外交部长”褚民谊、“宣传部长”林柏生联名电报催促,承诺事后派专机接他去南京任“体育部”副部长,李惠堂借口腿伤,予以拒绝。他对妻子廖月英说:“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,岂能当亡国奴,要我卖国求荣,做伤天害理事更办不到。”

李惠堂让廖月英带孩子先去五华老家躲避,自己则随南华队到澳门比赛前突然失踪,辗转到